



北大英烈

(第一辑)

北京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

北京大学出版社

新登字(京)159号

北 大 英 烈

第 一 辑

北京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

王效挺 江长仁 黄文一主编

责任编辑:阎达寅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大学印刷厂照排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875印张 250千字

1992年11月第一版 1992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000册

ISBN 7-301-01898-3/D·195

定价:5.75元

序

邓力群

北京大学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摇篮，是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的发祥地，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要阵地之一。革命战争时期，北大烈士们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壮烈牺牲的事迹，已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光辉篇章。北大党委决定出版《北大英烈》，给逝者以永志的慰藉，给生者以奋斗的激励，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

中国知识分子，有爱祖国，讲气节的优秀传统。五四以来中国历史光辉灿烂，几代知识分子前仆后继，北大应该说是代表性的。在帝国主义面前奴颜婢膝、卖身求荣，靠西方敌对势力钱袋苟活的，也有那么几个，不过如过眼烟云，为人民所不齿。铮铮铁骨，凛凛正气，以才华、青春、生命贡献于中华民族的解放和进步，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忠心耿耿，堪为民族脊梁和筋骨的，永远铭记在人民心里。北大烈士，已经查明 74 名，其中共产党员 64 名。共产党员中，李大钊同志是党的创始人之一，邓中夏、何孟雄等同志都是党的早期著名活动家。后来陆续在北大就读的青年相继走上革命道路，或者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在祖国各地，在各个方面、各个学科做出卓越贡献，都与这些先驱者的教诲、激励和影响密切相关。正是首先由于他们的活动，才形成了北大爱国、进步、追求真理的传统。他们是北大万千校友的楷模，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

中国共产党人和伟大的人民共同奋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已经走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七

十多年来,每一个成功都是克服挫折的结果,每一次胜利都是战胜失败的产物。越是敌对势力张牙舞爪,越是我们的同志慷慨就义,越是有一代又一代革命者挺身而出,迈出新的步伐,写下新的篇章。这里正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疾风知劲草。先烈鲜血染就的红旗,永远召唤着后来者奋勇向前。先烈生命换来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主义的尊严,绝不能任人宰割和凌辱!

尽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低潮,在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如同一片绿洲。我向读者特别是知识分子读者郑重推荐《北大英烈》。让我们由缅怀先烈而信念弥坚,用自己的行动,延续他们的事业,实现他们的理想。

1992年1月18日

编 者 的 话

在编写《战斗在北大的共产党人》一书的过程中，查明北大在革命战争时期的校友中，有烈士 74 名，其中共产党员 64 名。他们大都在 18 岁至 40 岁之间，为民族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许多同志牺牲在反动派的魔窟里和屠场上，不少同志牺牲在革命战争的战场上。南京的雨花台，上海的龙华，北京的“京师看守所”、天桥和安外，重庆的白公馆和渣滓洞；从西北的陕西、晋绥，到东南的浙江、福建，从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到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直至抗美援朝的朝鲜战场上，都有北大革命烈士的鲜血和遗骨。先烈们高度的爱国主义觉悟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是北大的骄傲和光荣，是北大革命传统的集中体现，是激励我们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

为了缅怀英烈、学习烈士们的崇高品质，继承先烈遗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北大党委决定分辑出版《北大英烈》。第一辑包括 26 名烈士，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和中共“一大”前入党的邓中夏、何孟雄、范鸿劼排在前面，其他按牺牲先后排列。

每篇传记前面刊印有烈士遗像，李芬、肖扬两位烈士的遗像，多方查找，尚未得到。

我们十分感谢邓力群同志，为本书写了一篇精辟的序言。许多单位、部门，特别是有些地区党史办、烈士陵园，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很大的关怀和支持，在此谨致衷心的感谢。

热忱地欢迎烈士们的战友、烈士家乡和牺牲地区的党史办、党史专家，为其他烈士们作传或提供事迹资料，使《北大英烈》第

目 录

序	邓力群
编者的话	
李大钊(1889—1927)	梁 柱(1)
邓中夏(1894—1933)	萧超然(40)
何孟雄(1898—1931)	江长仁(61)
范鸿劼(1897—1927)	赵 红(80)
张仲超(1904—1926)	江长仁(87)
孙炳文(1885—1927)	卞杏英 光 明(97)
邓文辉(1903—1927)	张宗高(114)
姚 彦(1903—1927)	田兴中 陈克君(117)
张挹兰(1893—1927)	丁 青(125)
李 芬(1904—1928)	刘让平 李谟璧 钟绳祖(135)
黄日葵(1899—1930)	江长仁(148)
张经辰(1903—1930)	中共禄丰县委党史办公室(170)
王青士(1907—1931)	周庆本(174)
刘雪亮(1908—1931)	陈 淦(187)
刘天章(1893—1931)	何晓梅(194)
任国桢(1898—1931)	段丽欣(204)
张甲洲(1907—1937)	梁宗仁(211)
夏次叔(1904—1938)	夏家骏(221)
陈伯衡(1906—1939)	王维赏(228)
王正朔(1909—1939)	李玉仙 王璋璋(233)

闵毓华(1913—1940).....	陈庭苔(239)
肖 扬(杨树义)(1915—1944).....	徐世昌(247)
魏十篇(1911—1946).....	牛星斗 党史言(255)
贺建华(1908—1946).....	屈水才 陈惠义 方文亮(273)
刘亚生(1910—1948).....	王效挺 黄文一(291)
陈大鵬(1930—1949).....	林道周(300)

李大钊

(1889—1927)

梁 柱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一生的光辉业绩和卓越思想,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和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值得特别指出,李大钊的名字是同北京大学相联系的。他的革命活动是从北大的“红楼”、北大图书馆开始的。他在北大培育的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主要发祥地之一的光荣革命传统,已成为北大师生的骄傲,并为之坚守不渝,发扬光大。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楷模,是值得后人永久纪念和学习的。

矢志于民族解放事业

1889年10月29日(农历十月初六),李大钊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幼年蒙师为其取名耆年,字寿昌,后改名大钊,字守

常。

李大钊幼失怙恃，其父李任荣(1867—1889)在他出生前即因肺病早逝；母亲周氏(1865—1891)也因丧夫哀伤过度，在生下他一年多后离开人世。正如他后来在《狱中自述》中所写的：“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姐妹”，孤苦伶仃，靠垂老之祖父抚养，相依为命。祖父李如珍(1827—1907)早年考取过秀才，后行商，置有房产土地，属小康之家。李如珍作为一个读书人，有着强烈的科举仕途、光耀门楣的传统观念，这时他则把这种希望寄托在孙儿身上，既抚爱有加，又严加管教。

李大钊自幼聪颖好学，从三岁起就学着认字，四五岁开始读蒙学课本，七岁入私塾读四书经史，屡经当地名师指教。所有教过他的老师，都交口称赞他的勤奋求学精神和取得的优异成绩，夸他是：“嗜读书手不释卷，博闻强记，品学兼优”。近年发现的李大钊九岁时(1898年)书录亚当·斯密《富国策》部分译文的墨迹，万余字的抄录均正楷小字，工整端正，运笔熟练。这不仅是李大钊童年刻苦学习的写照，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戊戌维新运动对这个冀东乡间的影响，使我们从这个抄录的墨迹中看到这时李大钊幼小心灵追求的端倪。

因为家中缺少人手，同时当地也有早婚习俗，李大钊十一岁那年同本村赵纫兰结婚。赵纫兰(1882—1933)是一位贤惠热诚、朴实正直的农村姑娘，比李大钊年长七岁。在李大钊上学期间，她独自操持家务，典当挪借，供应丈夫求学。李大钊对她十分敬重，彼此感情真挚。在北京共同生活期间，她深明大义，默默支持丈夫的革命生涯。李大钊牺牲后，她含辛茹苦担负起培育六个子女的责任。1933年参加李大钊葬礼后不久，含愤病逝，合葬于李大钊墓。

1905年，李大钊到永平府应试，虽然考中秀才，但因清廷停办科举，遂考入永平府中学就读。在这所新式学校里，他开始接触新学，攻读文史数理和英语，并在课余广泛搜寻传播新思想的书刊，

尤喜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时论文章。少年时期钦慕文天祥、洪秀全等英雄人物的朦胧的爱国思想，这时有了比较清晰的忧国痛时的炽热感情，开始了对救国拯民愿望的理性思考。他在这里结识了热血青年蒋卫平，俩人志同道合，引为知己。1910年蒋卫平在东北黑河地区为捍卫祖国领土主权而惨遭沙俄杀害，其时已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李大钊，闻讯悲恸万分，赋诗哭亡友，同时也抒发了自己忧虑国运的激烈情怀。诗云：

国殇满地都堪哭，泪眼乾坤涕未收。
半世英灵沈漠北，经年骸骨冷江头。
辽东化鹤归来日，燕市屠牛漂泊秋。
万里招魂竟何处？断肠风雨上高楼。^①

1907年，当李大钊所在的班级即将毕业之际，他已不满足于中学堂的教育，决计另辟新径求得深造，以施展自己报国之壮志。正如他后来所追述的：“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②这年暑期，他赴天津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在这里，他从预科到正科度过了六年的学习生活。

在这期间，青年李大钊目睹了辛亥革命由胜利复归失败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在他的思想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他的老师白毓昆因参加滦州起义不幸被捕，就义时立而不跪，昂首怒斥敌人：“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白毓昆烈士为共和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和壮烈事迹，给李大钊以深刻的影响，他一直怀念这位为革命献身的老师，多年后仍一再在文章中表示他的景仰之情。这时的李大钊已有较多机会了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广泛地接触了社会，这

① 《李大钊文集》（下），第899页。

② 《李大钊文集》（下），第888页。

使他更加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和人民群众的苦难,政治思想日趋激进。1912年11月,李大钊与同学见到日本人中岛端所著《支那分割之运命》一书,他与同学“怵于亡国之痛”,愤而写出数万言驳议文字。他们将该书全文译出并逐章逐句加以批驳,“字字皆薪胆之血泪”,以冀“为国人当头之棒,警梦之钟”。^①此书一出,立即风行全国。同年冬,李大钊为筹办北洋法政学会的刊物《言治》杂志来到北京,在京期间,他接触了中国社会党,结识社会党北京部主任陈翼龙(后被袁世凯杀害),并经曹百善介绍加入该党,后曾任社会党天津支部干事。《言治》杂志于1913年4月创刊,李大钊作为北洋法政学会的编辑部长,成为该刊的主要撰稿人。青年李大钊思想敏锐,文笔流畅,时人称“其文章浑厚磅礴为全校冠”。他在校期间先后写的《隐忧篇》和《大哀篇》两文,对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国造成的政治局面表示了深切的“隐忧”和“哀痛”,揭露了这种假共和真专制的实质。

1913年6月,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几年的学习,如他后来在《狱中自述》中所说:“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志趣亦日益腾高”。^②这进一步坚定了他“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③

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1913年夏,李大钊来到北京,一度主编《法言报》。此时正值“二次革命”失败,李大钊对辛亥革命的结局深为失望,深感为救国仍须作学问上的准备,于是在汤化龙等人的资助下,这年冬东渡日本留学。出国前夕,他借忆念在军中的友人郭厚庵,写下了抒发自

^① 《李大钊文集》(下),第127页。

^{②③} 《李大钊文集》(下),第889、893页。

已无限关注祖国命运的爱国诗章：

班生此去意何云？破碎神州日已曛。

去国徒深屈子恨，靖氛空说岳家军。

风尘河北音书断，戎马江南羽檄纷。

无限伤心劫后话，连天烽火独思君。^①

他后来曾记述了这次去国东渡的情景：“曩者去国，航海东来，落日狂涛，一碧万顷，过黄海，望三韩故墟，追寻甲午覆师之陈迹，渺不可睹。但闻怒潮哀咽，海水东流，若有殉国亡灵凄凄埋恨于其间者。”感时伤世，无限惆怅。至东京，参观其陈列馆，见到虏自中华之宝物，“莫不标名志由，夸为国荣”，使他“睹物伤怀，徘徊不忍去”，“人以纪其功，我以铭其耻；人以壮其气，我以痛其心。”这一切，都极大地激发了游子的爱国情怀，砥砺国人“一经创辱，痛自振励，起未死之人心，挽狂澜于既倒”。^②

1914年9月，李大钊未经预科直接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本科学习。他在这里广泛地阅读了中外文的社会科学著作，并开始接触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

留学日本期间，李大钊的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他除了勤奋攻读外，还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组织反日倒袁运动。1914年11月，李大钊在《甲寅》月刊发表了《国情》一文，揭露了袁世凯勾结帝国主义分子，矫称国情，制造舆论，企图集权称帝的阴谋。1915年1月，日本利用袁世凯急于称帝的野心，向袁世凯提出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作为支持他称帝的交换条件。消息传出，举国愤怒。留日学生更是情绪激昂，成立留日

① 《李大钊文集》（下），第908页。

② 《李大钊文集》（上），第122页。

学生总会，公推李大钊为文牍干事，起草抗议通电。李大钊慷慨命笔，“泣血陈辞”，六千余字的《警告全国父老书》，痛陈亡国惨祸迫在眉睫，呼吁全国民众奋起自救，他写道：“认定中国者为吾四万万国民之中国，苟吾四万万国民不甘心于亡者，任何强敌，亦不能亡吾中国于吾四万万国民未死以前。必欲亡之，惟有与国同尽耳”。^①这篇通电，迅速传遍全国，鼓舞和推动了国内的反日爱国斗争。这时，他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

不久，留日学生总会解散，李大钊仍坚持斗争。5月9日，权欲熏心的袁世凯，竟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胁迫下，接受了日本的“二十一条”。6月，李大钊编印了《国耻纪念录》，并发表《国民之薪胆》一文，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目的在于：“断绝根本兴复之生机，毁灭国家独立之体面，使我永无自存图强之实力”。^②激励国人坚持斗争到底。这时，袁世凯复辟帝制活动公开化，国内讨袁浪潮日益高涨。1916年初，在国内讨袁斗争的推动下，留日学生恢复了留日学生总会，李大钊被推举为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并主编机关刊物《民彝》。1月底，李大钊因联络讨袁事回上海，滞留两周返回东京后，得知学校当局竟以“长期欠席”为由除名。这时离毕业仅几个月时间，李大钊不计个人得失，倾全力从事讨袁斗争。他与留日爱国知识分子一道发起组织神州学会，这个团体得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的支持，团结了一批留日学生的骨干分子。5月间，李大钊在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后，立即启程回国。经过留学日本两年多的充实、探索和实际斗争，使他“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

李大钊在反袁斗争中的突出表现，使他在国内思想界成为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回国后不久，他立即投入了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1916年6月，他应汤化龙等的邀请，到北京办报。他担任总编

① 《李大钊文集》(上)，第123页。

② 《李大钊文集》(上)，第139页。

辑,并将报纸取名为《晨钟》。在8月15日出版的《晨钟报》创刊号上,李大钊发表了《〈晨钟〉的使命》一文,明确指明:“《晨钟》当努力为青年自勉,而各以青春中华之创造为唯一之使命,此则《晨钟》出世之始,所当昭告于吾同胞之前者也”。文章对青年寄予了殷切的希望,“青年所以贡其精诚于吾之国家若民族者,不在白发中华之保存,而在青春中华之创造”。^①

与此同时,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二卷一号上,李大钊发表了他任留日时写就的《青春》一文。这篇文章气势磅礴,才气横溢,以活跃的辩证法思想,充分论证了“再造青春中华”这一历史的要求,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②同前文一样,它以特有的青春力量,极大地激励了中国青年为创造“青春中国”而斗争。

李大钊以极大的热情,以《晨钟》为阵地,大力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猛烈抨击军阀政治。而他的这些思想激烈、笔锋犀利的文字,却引起了实际控制这张报纸的研究系政客的不满,时加掣肘。李大钊无法忍容这种现象,同时他对这些政客日益暴露出来的依附军阀的面目,也十分鄙视。这样,在他艰辛创刊二十多天后,就于9月5日愤而辞职,毅然离开了他曾经寄予厚望的《晨钟报》。此后数月,他“天天读书和研究问题”,并为《宪法公言》、《言治季刊》等撰稿。

1917年1月,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月刊在北京出版,李大钊应邀参加编辑工作。这时正值一班封建遗老遗少掀起尊孔复古逆流,要求定孔教为“国教”,鼓吹以孔孟伦理为立国之精神,而《宪法》草案也公然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因而新文化运动的斗争锋芒便集中指向了维护封建专制的孔子学说。李大

① 《李大钊文集》(上),第178页。

② 《李大钊文集》(上),第200页。

钊不顾章士钊的劝告，以《甲寅》日刊为阵地，向封建文化思想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他在日刊上发表的《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文，十分深刻地指明批判孔学的目的，他说：“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把文化思想上的反复古同政治上的反复辟联系起来，认定“古今之社会不同，古今之道德自异”。^①

在新文化运动前期，李大钊在反封建文化思想斗争中起了非常革命的作用，但他这时的政治视野不能不受到仍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历史局限；他虽然提出“再造青春中华”这一振聋发聩的主张，但仍不能正确回答中国的出路问题。李大钊在政治上对民主自由的热烈追求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不能不使他感到彷徨、失望以至悲观。他在1914年就曾无限感慨地说过：“时至今日，术不能制，力亦弗胜，谋遏洪涛，昌学而已”。^②而当1917年张勋再演复辟丑剧时，他不得不避走上海，在“淹滞沪滨”期间，他“百感交集”，慨叹十余年“流离转徙”，却还未能看到光明的前景。这种心情正如他在一首赠友人诗中所表露的：“一代华声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空愁”。但是，这种近似消沉的心态，既反映五四一代先进分子对过去种种努力仍无积极结果的深刻反省，也蕴含着他们对新的出路的思考和探索。李大钊是一位对于理想“期于必达，勿稍怠荒，月异岁新，与时俱进”的人，他仍在痛苦中继续求索着。早在留日时写的并发表于1916年5月《民彝》创刊号上的《民彝与政治》一文，在对中国的出路问题的思考时，提出“惟民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的设想，虽然仍以西方议会政治制度为模式，但同时又提出这种“代议政治虽今犹在试验之中，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

① 《李大钊文集》(上)，第264页。

② 《李大钊文集》(上)，第93页。

易，亦未可测”。相信若“其不良、其当易，其起而代之者，度亦必为校代议政治益能通民彝于国法之制，决非退于专制政治，可以笃信而无疑”。^①这种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怀疑和对未来社会必定进步的信念，为他接受科学的信仰奠定了思想基础。1918年5月，李大钊通过自己深沉的观察与思考后说：“中国今日的现象全是矛盾现象，举国人都在矛盾现象中讨生活，当然觉得不安，当然觉得不快。既然不安不快，当然要打破此矛盾生活的阶级，另外创造一种新生活，以寄顿吾人的身心，慰安吾人的灵性”。^②

李大钊发出“另外创造一种新生活”，这确是反映了历史的要求，它也将由历史的发展给予正确的回答。

任职北京大学

1917年初，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引进了陈独秀等一批新派人物。经过革新，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李大钊把这时的北大看作是“黑暗中之灯塔”，心向往之。这年11月，经章士钊之荐应聘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章曾对此回忆道：“时校长为蔡子民，学长陈独秀，两君皆推重守常，当然一说即行。”^③

李大钊一入北大，就以他的道德文章和在实际斗争中的杰出表现，逐渐成为北大以至整个思想界一面最先进的、最有影响的旗帜。章士钊在回忆中继续写道：“守常先充图书馆主任，而后为教授，还有一段可笑之回忆。盖守常虽学问优良，其时实至而声不至，北大同僚皆擅有欧美大学之渡金品质，独守常无有，浅薄者流，致不免以樊哙视守常。时北京民主运动正在萌芽，守常志在得北大一

① 《李大钊文集》(上)，第168—169页。

② 《李大钊文集》(上)，第537页。

③ 章士钊：《〈李大钊先生传〉序》，1951年8月。

席，以便发踪指示，初于位分之高低，同事不合理之情绪，了不厝意。由今观之，守常一入北大，比之临淮治军，旌旗变色，自后凡全国趋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五四说起，几无不唯守常之马首是瞻。何也？守常北方之强，其诚挚性之感人深也”。^①这一颇为生动的描述，虽比喻不尽确当，但从一个侧面可以看作是李大钊一生最重要的这个历史时期的写照。

李大钊出任北大图书馆主任，至1922年12月改任校长室秘书止，前后达五年之久。原来北大图书馆藏书少，设备差，制度也不健全。蔡元培整顿学校时，很重视图书馆的建设；李大钊主事后，制定改革方案，建立和健全图书管理借阅制度，并从国内外购进大量图书，其中有许多是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书籍和一批有关社会主义的文献。1918年10月，图书馆迁入了沙滩红楼一层新址，李大钊在这里开辟了二十一个书库和六个大阅览室。李大钊非常重视图书馆的作用，指出古代图书馆不过是藏书的地方，而“现在图书馆是研究室，管理员不仅只保存书籍，还要使各种书籍发生很大的效用，所以含有教育的性质”。^②这就从理论上说明了现代图书馆的性质和作用。经过李大钊的大力整顿。图书馆面貌焕然一新，成为宣传新文化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许多进步学生经常在这里聚会，向李大钊请教问题，共同商讨革命工作。

李大钊进入北大不久，就参加了《新青年》编辑部的工作。《新青年》杂志原是由陈独秀一人负责编辑的。1918年1月编辑部改组扩大，李大钊和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都参加了编辑工作。鲁迅回忆说：“我最初首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③这

① 章士钊：《〈李大钊先生传〉序》，1951年8月。

② 《李大钊文集》（下），第166—167页。

③ 《鲁迅全集》第4卷第523页。